

策 划：王立新 刘克选
撰 稿：刘克选 方明东 彭世畦 周全海
严潮斌 王 健 周 晔
责任编辑：李锦慧

北大与清华

下

本书首次从崭新的角度，精选鲜为人知的史实，以妙趣横生的文笔把产生思想伟人的北大与培育科学巨匠的清华进行了全方位的对比剖析，既充分展示了北大与清华在近百年传统与现代的激烈交锋中，几番脱胎换骨、跌宕起伏、慷慨悲壮的命运，又生动揭示了两所名校“毗邻而居，和而不同”的鲜明个性。真正是：

纵横百年史实，囊括奇人逸事，
借鉴名师之说，探寻育才之道。

ISBN 978-7-80140-007-9



9 787801 400079

定价：87.00元（上中下）

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

北大 与 清华

下

主编 刘克选 方明东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书·

北大与清华：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刘克选、方明东主编.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 4

ISBN 978—7—80140—007—9

I. 北… II. ①刘…②方… III. ①北京大学—校史②清华大学—校史 IV. G648. 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250 号

书 名 《北大与清华——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下)
作 者 刘克选 方明东 主编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100089)
电 话 (010) 68920640 6892903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版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36
字 数 6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140—007—9
定 价 87.00 元

目 录

中 篇 变迁与磨难(续)

第十一章 学术批判与反右斗争	(1)
一、更为深刻的思想改造运动	(1)
1. “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2)
2. 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3)
3. “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	(4)
4. 梁思成的遗憾	(10)
二、大鸣大放与反右斗争	(13)
1. 自由是改造的起点	(13)
2. 大鸣大放与燕园、清华园内的反右斗争	(17)
“中右标兵”傅鹰	(22)
“规律只是斯大林语录”	(24)
“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	(26)
《花丛小语》与“歌德——但丁派”	(27)
“要培养一批万金油式的干部”	(29)
百花学社：“右派分子反动小集团”	(29)
三、拔白旗，插红旗	(31)
1. “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	(31)
2. “红”、“专”大辩论	(32)
3. 社会主义民主的武器	(33)
4. “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	(38)

第十二章 “造反有理”——扭曲的北大与清华	(42)
一、北京大学“爆炸”了	(42)
1. 北大点火	(42)
2. 驱赶工作组	(46)
二、蒯大富造反清华	(50)
1. 王光美进驻清华园	(50)
2. “兵团司令”出世	(53)
三、红极一时的“梁效”	(55)
第十三章 在劫难逃——噩梦中的北大与清华	(60)
一、“反动学术权威”在劫难逃	(60)
1. 以死抗争	(60)
2. 立其诚	(62)
3.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63)
二、“斗、批、改”与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	(64)
三、“教育革命”：“革”了教育的“命”	(69)
1. 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教育革命领导权	(70)
2. 废除考试的招生制度	(73)
3. 教学改革	(75)

下 篇 再造辉煌

第十四章 噩梦方醒时	(82)
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恐怕不能这样办”	(82)
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84)
三、“怕也好，想也好，反正谁也少不了”	(86)
四、“小平您好！”	(88)
五、“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91)
第十五章 经济大潮冲击下的燕园与清华园	(93)
一、是“像大官大贾那样风流，还是像老教授那样穷酸”	(93)
二、翻书页和数钞票的抉择	(96)

三、“皇帝女儿”愁嫁了	(99)
四、新“绿色和平运动”	(101)
五、变幻莫测的校园文化	(110)
 第十六章 难圆的梦:距国际一流大学还有多远	(119)
一、世界高等教育的兴起探源	(119)
二、世界一流大学,让我们走近看看你	(122)
1. 一所学校占了一座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22)
2. 诺贝尔奖的 70%被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们捧走了	(126)
3. 世界一流大学: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128)
4. 一流大学的校长——“在家看起来像老鼠, 在外面看起来像雄狮”	(132)
5. 库班说,斯坦福大学所聘用的教师是他们 所在学科中美最著名的前五名学者	(136)
6. 办学经费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过分”	(139)
三、不进则退,世界一流大学在不停地进行改革和创新	(142)
 第十七章 新起点:崛起中的北大与清华	(144)
一、“211 工程”	(144)
二、“大学原来是这样的!”	(146)
三、学科建设是学校安身生命之根本	(147)
四、总还应该出一些名家大儒	(150)
五、这里应该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心	(153)
六、创高新科技产业,走产学研结合之路	(155)
七、“跳起来摘果子”	(158)
 第十八章 毗邻而居,和而不同——北大清华风格之比较	(162)
一、“你们有未名湖吗?”	(162)
二、北大,思想家与革命家的圣地清华,实干家与工程师的摇篮	(163)
三、北大:“自然算大”	(166)
四、清华:“天生务实”	(169)
五、北大人心目中的清华和清华人心目中的北大	(172)

1. 激进抗争与踏实肯干的反差	(173)
2. 充满朝气与紧张沉稳的反差	(173)
3. 狂傲清高与谦虚谨慎的反差	(174)
六、难解的北大情结和永远的清华能力	(175)
后 记	(178)
附录一(北京大学历届主要领导人)	(180)
附录二(清华大学历届主要领导人)	(182)

第十一章 学术批判与反右斗争

通过 1951 年 9 月到 1952 年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师思想上有了显著进步。但多年形成的旧思想旧观念，决非经过一场运动可以彻底改变。1953 年后，中共中央利用批判俞平伯、胡适、梁漱溟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号召知识分子开展学术问题上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以克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促进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与以上三人有着历史渊源并汇集了中国社会科学精英学者的北京大学也投入了这场学术批判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中人人过关，“脱裤子、割尾巴”造成的心理上的余悸，新社会高歌猛进新气象的推动，批判者本身对马克思主义学习、掌握不深等因素，造成了学术批判过程中政治声讨意味浓厚，学术批判的科学、理性因素明显不足。学术批判虽然触及了文化教育、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对相关各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的促进作用也打了折扣。1957 年反右运动中，北大、清华众多师生被划为右派，成为右派集居地。运动过后，学校进行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再次进行学术批判。随着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日益严重，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愈来愈受政治运动的影响。

一、更为深刻的思想改造运动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崩溃，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这就必然对思想意识形态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新政治、新经济呼唤新文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

要任务。”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同旧文化的斗争中，建立新文化，成为时代课题。1951 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 年对《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观点及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 “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电影《武训传》描写了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武训原名武七，“训”是清朝政府后来嘉奖他行乞兴学“为天下后世训”而赐给他的名字。武训出身于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十几岁时给地主家扛活，地主欺侮他不识字，侵吞了他辛辛苦苦挣来的工钱。他感受到不识字的苦处，于是决心创办义学，使贫苦的农家子弟读书识字。他用吃砖头瓦块蛇蝎粪便，喝脏水向人下跪磕头，趴在地上让人骑，任人拳打脚踢等办法乞讨。用行乞所得兴办义学。影片歌颂了武训行乞兴学活动，“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影片的开头和结尾处加上了女教师在武训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上赞扬武训的话，说他“要了 40 多年饭，办了 3 所义学，让穷孩子们也能念书学文化，真正了不起”，“学习他刻苦耐劳的作风，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1951 年初电影公映后，赢得了一片赞扬声。1951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尖锐地指出影片在如何表现历史人物、如何对待中国人民斗争的道路上，存在“带有根本的性质”的错误，批评影片的歌颂者们没有研究“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到了何种程度”！对此应该展开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随着一个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便开始了。批判者认为武训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不足为训，是一个根本不值得赞扬的历史人物。《武训传》的思想内容是反历史的，歪曲了革命，用改良主义代替人民革命行动，是反动的等等。正如周扬同志在《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文中指出的：影片“污蔑了中国人民历史的道路，宣扬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用改良主义来代替革命，用个人奋斗来代替群众斗争，用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电影《武训传》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处理上存在着一些缺陷，毛泽东写的社论对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促进文化界思想进步有一定积极作用。但

这次批判运动也存在着缺点和错误。正如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所指出的：“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在学术批判中给被批判者“贴标签”、戴帽子这种方法在以后的学术批判中继续下去。

2. 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1952年9月，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将他在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辩》经过修改，改名为《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1952年3月俞平伯又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俞平伯以胡适所提倡的实用主义的思想和方法，撰写了许多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成为著名的“新红学派”的主将，影响较大。早在30年代就有人说：“自从《红楼梦》经过胡适之、俞平伯两位先生辩证以来，仿佛所有的难题，都已解决，而他们的定论，也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凌空一切。”

《红楼梦研究》出版后，引起学术界重视。1953年5月，《文艺报》第9期的“新书刊”专栏里介绍该书，认为“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作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成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不少。”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名青年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他们写信问《文艺报》可以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又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得到了支持，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9月号上发表了该文。这篇文章批评批判俞平伯“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大肆赞扬所谓的红楼梦“怨而不怒”的风格，“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俞平伯“钗黛合一”说，调合了两个对立形象“尖锐的矛盾，抹煞了每个形象的社会内容，否定了二者本质上的界限和差别，使反面典型与正面典型合而为一”。总之“俞平伯是以反形式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

此文发表后，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被拒绝。《文艺报》同意转载（1954年第18期转登），

但主编冯雪峰写了编者按。1954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评了《文艺报》和《人民日报》，认为李、蓝的文章“是对30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不应当对他们投降。”在毛泽东这封信的精神指导下，文化思想界把原属学术批评的论争，当作一场重大的思想批评运动开展起来。正如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同光明日报记者谈话所说：“这不仅仅是对于俞平伯本人、或者对于有关《红楼梦》研究进行讨论和批判的问题，而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

从1954年10月31日起，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了八次扩大会议，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全国各大学文科专业、各文艺团体，纷纷举行座谈会，写文章批判“新红学”，全国各地报刊也发表了许多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这场学术批判虽然进一步肃清了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唯心主义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思想文化工作者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水平。但是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也带来了若干不良影响。把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当作政治问题，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把学术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来批判。甚至认为俞平伯的文学见解“不但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封建的”，“引导读者逃避革命”。这种做法不仅“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新红学”全面否定，没有客观地认识俞平伯研究过程中的贡献。

3. “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

胡适同北大渊源较深，曾做过北大校长，在北京大学有他的同事和学生。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北京大学曾批判清除过胡适的影响。北京大学中文、历史等系师生召开批判会，胡适的同事、学生如俞

平伯、杨振声、顾颉刚、汤用彤、朱光潜等作了批判发言。北大一些教授在检讨自己思想以后，“公认胡适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不应是单纯地批判胡适个人，而应该在北大和受过胡适影响的人身上搜寻胡适的影子。”但这次的批判很快就结束了。

对俞平伯的批判，由于俞平伯是继承了胡适的研究传统，因此很自然地，批判锋芒转向胡适。郭沫若在1954年11月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反映了学术界批判胡适的必要性。自“五四”运动以来30余年，胡适的思想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郭沫若说：“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说我们还很少去碰他。”12月18日，在文联、作协的联席会议上，周扬进一步指出，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卖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它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因此，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任务。”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思想批判运动。在1955年1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同年3月1日，中央又发表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想”；“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一般应当服从于向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宣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的基本方针”；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讨论时，应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4年底，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批判，就扩展为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批判。1954年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

会议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到1955年3月，共举行了21次讨论会，集中批判了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等六大方面。

建国后，经过院系调整，北大聚集了大陆文学界、史学界、哲学界等领域的精英。这些学者中有很多人与胡适是师生关系或交谊甚厚。在批判胡适思想时，北大成为一个重要阵地。从政治思想和立场、历史观、文学思想、文学史观及方法论、哲学思想等方面进行全面批判。

金岳霖、汪子嵩、张世英、黄枬森批判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认为“实用主义是腐朽的主观唯心论哲学”，“是反科学、反认识，特别是反理性认识的蒙昧主义哲学”，胡适宣传实用主义“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垂死的中国封建势力，特别是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服务。”冯友兰、朱伯崑批判了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认为胡适“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生和发展的解释，对古代哲学思想的评价，都是这种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和庸俗进化论底表现和应用。”

周一良等人批评了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认为它是反历史、反科学的反法。荣天琳批评了胡适实用主义唯心史观，认为胡适宣传的“多元历史观”实质上是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胡适所伪装的‘只反对经济史观’‘超乎唯心论之上’和他提出的所谓的‘多元历史观’等等，都是骗人的把戏，而其本质还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论。”

游国恩、蔡仪、王瑶认为胡适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祖国文化遗产，降低了对一些古典文学的评论，主张全盘西化。王瑶在《辟胡适的所谓“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一文中就指出：“胡适以所谓‘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点’，以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来宣扬他的崇美亲美的思想，宣扬他对祖国古典文学遗产的虚无主义观点”。

贺麟、冯友兰等也一面撰文批判胡适，一面检讨自己。贺麟先生在30年代从国外学成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在清华兼课。1947年当了训导长，在任期间，他多次压下朱家骅（当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通过胡适转过来的要求开除进步学生的信，对于特务学生报告的黑名单也锁进抽屉了事。他还保释了许多学生和青年，后来甚至师大、清华的学生失踪了，也托他和郑天挺打听。北大50周年纪念时，北大学生会给了他一

面上绣“学生的保姆”的锦旗。北平被围时，南京方面三次通知贺麟坐飞机逃离北平，但他留下等来了解放。在思想上，在解放前他就讲过：“我们处在一崭新的过渡时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信仰均起了空前急剧的变化。其巨变的程度，使许多激烈趋新的人，转瞬便变成迂腐守旧的人，使许多今日之我，不断与昨日之我作战的人，但犹嫌赶不上时代的潮流。”（《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有这种转变的准备，解放后经过参加土改，思想开始变化。学术界掀起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后，贺麟由于在1953年的“洗澡”（思想改造运动）中公开讲清和检讨自己同国民党的关系（相信三民主义可以致中国如汉唐盛世那样强大，抗战期间多次受到蒋介石接见等），一些人觉得他“很臭了”，不让他参加批判胡适的写作班子。其实贺麟很早就对胡的实用主义、一味崇洋和宣布“哲学要关门”的思想持反对态度，曾在北大的哲学课堂上公开点胡适的名：“你胡适倒要被关在哲学的大门之外”。贺麟写了《两点批判，一点反省》的论文登在《人民日报》上。一方面站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上批判胡适思想，一方面检讨自己的唯心论。在“反省”中要“自己照一下镜子”，即“正视自己在解放以前的反动思想，照一照自己那时丑恶面目的原形”。认为“在解放前，在学术思想方面我和胡适曾有过唯心论内部派系间的矛盾，但反人民革命、反共产主义的目的，我和他却始终一致。”胡适的实验主义与自己贩运的新黑格尔主义，“只是分途去达到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一目的。”表示经过思想改造以求得到新生确属必要。

冯友兰的《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联系》（1955年3月《哲学研究》第1期），批判了胡适在四个历史时期的关于哲学史的著作，“都是针对着那些时期底革命形势底发展，都是与当时的革命形势相对抗的。”同时冯友兰也对自己的新理学进行批判，认为“新理学”，也是“反动哲学思想”，“除了孔子底‘正统’思想之外，我又企图恢复朱熹的‘正统’……以所谓‘新宋学’补充胡适的‘新汉学’，以更加深地发挥封建主义底‘正统’思想”。冯友兰还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报告会”的发言中，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同时结合批判自己过去在学术研究中与胡适相同的观点。1955年6月又在《哲学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两种反对思想支配下的文化论——从批判胡适到自我批判》。

这次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在我国学术界引起震动，对学术研究发生了深刻影响。以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般没有涉及学术思想问题，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很少联系批判学术思想，这次以批判唯心主义哲学为中心，旁及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各部门的唯心主义思想。对知识分子而言，这无异于更为深刻的思想洗礼，是深层次的思想改造运动。但是这次思想批判运动本身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正如《中央宣传部长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所说：“由于我们理论工作基础薄弱，虽然发表的文章很多，而且水平逐渐提高，但好的文章终究还嫌太少，目前发表的文章也是什么问题都说到一些的概论性的居多，集中一个问题作比较深入分析的较少，揭露批判的居多，结合批判作正面宣传的较少，在批判中进一步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更少。”在批判方法上“常常摘引胡适的几句话就大做文章，用驳斥胡适每一句话的方法来进行战斗，甚至还不符原意地加以引申，连同胡适用来伪装自己的、本意正确的话也加以否定。有的论证不多，说理不够，结论武断。”这些缺点的存在使一些人对批评者完全否定胡适不满。认为批评者对胡适的著作没有好好研究“引来引去只是那几句话”，批评文章质量不高，说服不了人。对这场批判运动也还是有人持异议的。曾在清华任教多年时为中山大学教授的容庚，在中山大学召开的座谈会上公开发言为胡适的学术业绩辩护，并要求中大校刊发表他的发言稿。他的发言稿被发表，但遭到批评。另一在清华任教多年，时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教授则只留下“一犬吠声，百犬吠影”的八字评价，这被注释为骂那些积极参加运动的人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这些言论在当时那样全国性批判和声讨中是不能左右批判方向的。

当然，对胡适的政治批判淹没了学术讨论，在当时的背景下有其历史合理性。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所提出的：现在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学术各个领域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的有效方法。认为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在学术领域中反对唯心主义斗争，会使党的干部、全国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受到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会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鄙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更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这种批判运动是与政治经济的改造相配合，确立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确

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但这种批判所带来副作用也影响深远。论者有言：“在这一场真正锻炼人、改造人的批判运动中，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一种先验的、机械的思维模式：凡是政治上反动的学者，其学术必定是为反对政治服务的，因而是一无是处的，不值一文的。其哲学基础必定是‘唯心的’、‘反动的’，因而学理上也必然是荒谬的、错误的、愚蠢的。”不断的政治运动使这种思维模式不断强化，其最后的结果是束缚、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和进步。

在批判胡适的同时，长期以来和胡适处于对立面的梁漱溟也在劫难逃。自五四运动以来，梁漱溟就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但无论批评或表扬，都把他当成一家之言。解放以后，这种“一家之言”的地位动摇了，他成了“旧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被列为“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

1953年，梁漱溟在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即席发言，说：“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的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不久，梁漱溟又在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直接冲突。此后，梁漱溟变成众矢之的，一场大规模的批梁笔战如箭在弦。

1955年5月11日，冯友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一文后，哲学界、理论界名人纷纷撰文，从文化理论、哲学理论和乡村建设理论等几方面批判梁漱溟，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批判者认为，梁漱溟是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代表；他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些著作主要是给他的反对革命的行动寻求理论根据；他一方面吸取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反理性主义的糟粕，一方面也大量吸收了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罗素等人的反理性主义的毒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及方法在本质上就是要在乡村建立地主武装、保护封建秩序、麻醉农民，以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对共产主义。

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的同事也卷入了这一批判的潮流。如汤用彤、任继愈在《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生命主义的实质和它的毒害作用》中，批判“梁漱溟所谓的‘孔子精神’和‘中国文化’一方面吸取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反理性主义的糟粕，一方面也大量吸取了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杜里舒、罗素、倭铿、克鲁泡特金等

人的反理性主义的毒素”。“他的根本意图就在于建立一套反动的、适合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求的反动哲学体系，来对抗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和蒋介石、陈立夫匪帮法西斯主义的生命派的哲学完全一致。”而冯友兰在《批判梁漱溟所谓“周孔教化”》一文中说：“梁漱溟强调他所谓‘周孔教化’是非宗教的，这是他的《中国文化要义》的重要论点之一。这一点须要进一步的批判。”他说：梁漱溟歌颂儒家的“礼乐运动”，正是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日益广大深远的时候，梁漱溟说：“古时儒家苦心孤诣努力一伟大的礼乐运动，以求消灭人祸于无形……”这个“人祸”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为抵抗这一运动，梁漱溟还想用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把人民“安排妥当”。贺麟在《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一文中指出，梁漱溟的直觉主义是以自己的主观意见为中心的主观唯心论，梁氏认为宇宙是生命或生命的连续体，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并从生活后面推出一个“大意欲”或叔本华的所谓“世界意志”，又从柏格森那里得来生命的活动的观点，将其与罗素的“创造的冲动”和孔子的“仁”混合起来，加以绝对化。孙定国、朱伯崑、金克木、周辅成等也分析地批判了梁漱溟思想的来源及其反动哲学。

对于这样的批判，政治声讨代替了学术辩论，它并未能使被批判者心服，也未必有利于接近真理。梁漱溟在1956年的一次政协学习会议上说：“去年一年对我的思想批判，……我没有作过任何表示，只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曾表示拥护这一批判运动。当时郭沫若先生说，他对我说的话是否‘由衷之言’要打个问号”。“对的，我心里并不像口里那样简单直捷。内心是有矛盾、有斗争的。……古人闻过则喜的话，我在去年看到的各篇批判文章，还不能说对每一篇的每一处心悦诚服。……有没有抗拒心呢？有的，不过终于克服了它。”

4. 梁思成的遗憾

北京作为中国著名的古都，文物众多。当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北平被围，怎样使古都避免毁于兵燹战火，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毛泽东一再电告人民解放军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北平的工业设施和重要文化古迹，在攻城演习中也力求不使炮弹毁坏文化古迹。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和罗哲文等向解放军提供了《全国重要文物简目》。

1949年1月16日，傅作义请北平二十余学者名流开会，讨论局势，以作最后定夺。徐悲鸿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这里许多